

远山

宋聚丰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86
I247.5
1891

BK28124

3

远 山

宋 聚 丰

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

远 山
宋 聚 丰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1/32 9.75印张12插页 244,600字 印数：1—3,200 1986年6月第1版
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286·234 定价：1.90元

内 容 提 要

一对真诚相爱的青年恋人，为什么迟迟不能结为伴侣？两个骨肉相连的庄稼汉，为什么多年没有相认？这部以冀南山区农民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，通过动人的悲欢离合故事，塑造出老支书姚连景，青年寡妇邢春苏，新型农民杨新堂等现代农民形象，反映了当前农村改革的火热生活，写出了农民的欢乐，痛苦，追求，生活命运及人生观念的变化。

小说故事曲折，文字优美，自然地展现出一幅幅风光秀丽、风情淳朴的太行山村风俗画，给人以如临其境的享受和深刻的启迪。

作 者 近 照



作 者 简 介

一九五二年十一月生于河北省邢台县羊范村，七五年毕业于河北师院中文系。先后在县委宣传部、地区群艺馆、地区文化局工作。一九七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一九八三年加入作协河北分会。一九八二年，发表中篇小说《白云升起的地方》，获省优秀作品奖，之后发表《宝石》《汤泉风情》等中篇小说，并发表长篇小说《远山》。

找到艺术的“立脚点”之后

——读《远山》札记六则

(代序)

周 申 明

—

“中篇小说《白云升起的地方》，在文坛上‘升起’的同时，也‘升起’了一颗文学之星。”这是在大约两年前，这部中篇参加河北省文学创作评奖时，我和几位同志对宋聚丰同志的一种看法。那时，我们是从作品去认识作者的。虽然，就《白云升起的地方》说，尽管还有新作者常常难以避免的斧凿痕迹，稚嫩和可议之处也有不少；但是，这个作品的虎虎生气，它的思想艺术力量，又充分表明它获奖是当之无愧的。特别是，作品中关于太行山区的勾勒与描绘，展现了令人为之神往的“充满春光和希望的世界”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这以后，作者发表了中篇小说《汤泉风情》，最近又发表了他的长篇小说《远山》（《长篇小说报》1984年第二期），都与太行山区结下了不解之缘，而且作者的笔力所向，是朝着太行山的深处拓展，这更使我感到由衷的喜悦和

极大的兴趣。

太行山正待开发。太行山的“千山万壑”正在被开发。开发太行山的重大意义，是我们大家所共知的。

太行山区的文艺矿藏同样是富饶的，急待开发的，也是有条件予以开发的。远的不说，古代文人对太行山一带的描绘与歌颂，我们姑且不论。仅就现代文学发展史看，这里就产生过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作品，诸如赵树理、孙犁等人的优秀小说，贺敬之、阮章竞等人的著名歌剧《白毛女》、《赤叶河》等，以及名震遐迩的“街头诗”和如火如荼的边区文艺运动与创作。即以叙事诗创作来说，以太行山区人民生活为背景的，南有《漳河水》，北有《赶车传》，中部有我国诗歌史的第一部“报告长诗”《戎冠秀》，等等。这一切说明，太行山区确是一个文学富矿，开掘它并为太行山人塑像，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上是有光荣传统的。

苏联作家阿·托尔斯泰，在《向工人作家谈谈我的创作经验》一文中说：“当你们在写什么事物或者什么人物，或者描绘什么东西时，你们都应该找到一个立脚点，这是指真正意义上的，而不是指其他间接意义上的立脚点——这指的就是观察事物的眼光。”我们感到欣慰的是，宋聚丰在开始创作不久即找到了一个“立脚点”，而且是大有用武之地的“立脚点”。从河北省的中青年作家来看，他笔下的太行山区的远山远水、风土人情，既有别于陈冲、铁凝作品的风貌，也不同于贾大山、汤吉夫作品的色彩，和单学鹏、杨显惠描写的海上世界更是各有其特色。这当然不只是文学题材的差别，而是就其作品的总的倾向与风采来区别的。应该说，在我们这里，一批文学新人开始找到自己创作的“立脚点”，是他们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，也是整个文艺创作可望丰收与繁荣的好兆头。

因此，读宋聚丰的《远山》，我的第一个感觉，是他在创作中找到了一个“最佳位置”，他的作品越来越具有鲜明的“山”的色

泽与品格。我甚至隐隐觉得，他的笔锋在太行山区驰骋，有如《远山》中的老人姚连景回到离别的故乡一样：“蓝天、白云、青山、绿水，都是那么秀丽，那么亲近。他如鱼还水，似鸟入林，……举止自如，浑身舒坦。”然而也正如姚连景回村遇到新的矛盾和困难一样，作为第一部长篇小说创作，宋聚丰在驾驭与开拓《远山》时，也有他的难度与难处。从整个作品来说，他的笔力既有游刃有余、闪光生花之处，也有发涩、困顿以至难支之时。可以说，《远山》的优长及其某些不足，都是明显的，是值得引起我们关注的一部好作品。

二

一个作家，尤其是一个年轻作家能很快找到自己的艺术“立脚点”，在创作中找到自己，是值得庆幸的。但是，这并不等于优秀作品的自动完成。这里，还有一个艰辛的创造过程。要用自己的“眼光”发现并开拓所选题材的内涵与底蕴，深化作品的主题思想并使之富于新意；要发现并塑造出一批各种各色、姿彩不同，又在各自的“位置”上“生活着”的人物；还要探求一种适合于读者审美需要，又适宜于表现作品思想内容的艺术手法，等等。应该说，这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事情。特别是在“改革文学”发展到今天，强手如林、佳作时现，要想在这时代的交响乐中找到自己的声音，对《远山》的作者来说，困难是可以想见的。

目前反映时代变革生活的改革文学，已逐渐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。这是令人振奋的一件好事情。其中，有反映工业改革的，有反映农村改革的，有反映城市和领导体制改革的。在反映农村生活方面，一些作品描写了农村经济政策的变革给平原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，有的作品则描绘出山区乡村在变革中的发展与进

步。然而，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反映山区变化者，而且写得颇具特色、较有生活容量和艺术分量的，我认为《远山》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作品。作者选择了一个深山区的“老模范村”，作为自己笔下人物活动的主要环境。这个有着二百多户人家的八仙庄，从农业合作化以来一直是地、县的先进典型。虽然，前两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，为分地，老支书姚连景“气得半死”住进休养院，他的侄儿、现任支书姚新泉却能“一手遮天”、左右逢源，使八仙庄保住了“先进”。眼下就是一九八三年春节，八仙庄一家“合爨大礼”的酒宴正酣，“高音喇叭伊伊呀呀不住地唱，唢呐笙管嘀嘀哒哒卖力地吹，鞭炮爆竹崩崩嘎嘎生脆地响。”在作者的笔下，不乏山区的春节风俗描绘。但是，风俗画中有风暴。为大队的机制砖窑的公开投标承包，八仙庄演出了一幕幕牵动人心的话剧。一方是外号具有三寸不烂之舌、恩威并济之术的“说客”姚新泉；一方是村里五十位青年的带头人、被称为“可教子女”的摘帽地主子弟的杨新堂；中间是前后倾向有变的老支书和婚姻横生波折的大春苏。顺便提一句，这两个看似站在这场变改之旁的局外人，实则是为改革的潮流牵动最深，因而也是作品中写得最活、最富典型意义的人物。这一点暂且按下，我们将在下边作具体分析。

从上所述，不难看出《远山》在人物布局上是有特点的，在环境安排上是有特点的。同时，它在时空交错、事件处理上也是有特点的。故事发生在除夕至正月十五元宵节期间，确切地说，只写了除夕、正月初五、正月十三至十五日的“三天记事”。而作品中承包砖厂事件，又没有去作“过程描写”。它的着力点在于，描写变革生活的步伐已经深入到远山远水，农村宣传责任制后，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，给人们自身的命运、思想、道德、婚姻、爱情等方面带来新的变化，特别提出了调整生产关系和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问题。这是别开生面的，

也是作品的深刻性所在。

请听，八仙庄里的一首歌谣：

大支书住进休养院，
二支书自己说了算，
三支书站在一边看，
剩下社员搞单干……

这里所谓的“搞单干”，是村民们一个时期内的愤激之语。可是，“言为心声”，这样不脛而走的“顺口溜”，恰恰真实地反映了群众的情绪：有怨、有刺、有期望，期望大队党支部能够带领他们一同前进。“大支书”即老支书姚连景，因病休养；“三支书”即大队长温同兆，“形同虚设”；“剩下”一个“二支书”，即现任支书姚新泉以权谋私、独断独行，把全村男女老少都视为“木偶”，一心想当上村里“说一不二”的“土皇上”。加上极“左”思想的影响与流毒，旧的习惯势力的惰性以及封建宗法观念作祟，使这个既反对农村变革、又利用改革大捞油水的“姚家后代”，很是踌躇满志，不可一世。他甚至把当前的农村改革视为一场“纷乱”，而他却以“观山景”的诸葛亮自喻。小说的最后，他虽然处于劣势，感到了自己掌管的“小天下”根基不稳，但他从心里并不认输。矛盾和斗争在八仙庄未来的生活中，还将是不可避免的。

很明显，作者笔下的远山村野，作者笔下的各色人等，“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、离群索居的人，而是处在于一定条件下进行的、现实的、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的人”。^①而正是通过对这些“发展过程的人”的描绘，作品比较鲜明地提出了

① 马克思、恩格斯《费尔巴哈论》（见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一卷，第30—31页）。

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问题。这一点，是作者的新见地，也是当前改革文学中很少接触的问题。

三

《远山》的独创特色，不仅表现在题材的把握与主题的提炼上，更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。黑格尔说过，作品的独创性是从对象的特征来的。我认为这是颇有道理的。就《远山》来说，它的独创性集中的体现在对人物特征的把握与描写方面。在这部二十一万字的长篇小说中，作家为我们刻划了一批独具“特征”的艺术形象。这之中，有的为当代文学人物画廊里所鲜有；有的人物虽然不是我们的“新相识”，却蕴藏着作者的新见解、新认识。当然，在“对象的特征”的把握上，作品并不是无懈可击的：有的新人形象，还写得不够深透、尚欠火候。这些，我们将加以评述。

先看姚连景。这是一个人所罕写、“特征”鲜明的艺术形象，也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。这位八仙庄的老“带头人”，有过极为光荣的历史，珍藏着八枚纪念章与奖章。这之中有华北、中南、西北、西南解放纪念章，有淮海战役纪念章、渡江纪念章、抗美援朝纪念章和二等功勋章。他随部队南征北战，还曾经把一条右腿丢在朝鲜战场上。可贵的是，他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图享受。一九五三年转业时，他本来可以住进荣军疗养院，但他一心想着自己心目中的“江东父老”，主动要求回到村里，安上假腿，搞起合作化，被选为支部书记，一干就是三十来年。这期间，八仙庄成了远近闻名的“老模范村”，成了全地区农业上的“一杆旗”，姚连景也成为全省有名的模范人物。然而，老模范遇到了新问题。历史的列车进入了新时期，我们的党开始清理长期以来在经济战线、尤其是农业领域里的“左”的东西，并且实施了一套

新的富民强国的方针、政策。可能是历史的车轮运转得太快了吧，也可能“左”的影响与流毒，已成了他思想性格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。他不止一次地感觉到自己是“落伍”了，以至有被列车“甩下去”的危险。他也曾不无自责地思索：从啥时起，自己从八仙庄的带头人，变成了人们的累赘？可是，这种落伍感和失落感，一旦和“过时的旧曲”搅合在一起，他的感情往往又倾向于过去，受“左”字干扰，以“左”视为正，甚至在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，这位八仙庄的老模范“为分地气得半死”，成了当地极左思想干扰改革的一个典型事例。从此，他因病“卸任”，住进地区休养院，一再表示不再“干扰”村里的工作。

但是，姚连景是不同于姚新泉的。他毕竟是位老党员，老模范，也是一位真心诚意想把八仙庄的事办好的基层干部。他有两句出自心灵深处、也是总结了自己大半辈子人生经验的话，叫做什么时候都“不能办对不住党，对不住群众的事”。就他的个人品德来说，我们可以说，姚连景是无可厚非的，我们也会和邢春苏一样“可怜”他，同情他，敬重他。然而，如果从对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利来看，姚连景又确如他自己所承认的，他有时是成了绊脚石。而且，这样“真诚”的同志终于同“左”结下不解之缘，就更会给工作与生活带来复杂性，甚至连儿媳改嫁的事，他也处理不好，弄得满街风风雨雨。作者的机智之处，是让他住进休养院，可又心牵梦绕八仙庄，终于又回到了八仙庄。作品里，有一段姚连景遥望远在故乡的山峦的描写，是情浓意厚、耐人寻味的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这部长篇的立意可以叫做：远山的瞩望，时代的召唤。而姚连景正是作家所着力刻划的中心人物。从作品中的人物群来看，几乎每个重要人物都同他关系甚为密切；从作品所展示的矛盾与纠葛来说，又大都借助于他两次回村来贯穿和解决；而八仙庄的变革与前进，通过姚连景的眼光观察，又增加了作品的可信性与光彩。对于这样一个堪称典型的人物，作者在

艺术手法上未去做更多的、外在的铺排，而主要得力于让人物“自己表现自己”的描写艺术，通过夜探砖窑，挥泪离村和二次回村理风波等情节来展现的。

除夕夜独自探砖窑，是一段引人注目的笔墨。

……姚连景走到砖窑跟前，伸出粗糙的大手，抚摸着冰冷的窑墙，就象抚摸孩子的身体。这建窑的红砖，还是他亲自到县砖厂订的货呢，都是又结实又平整，有棱有角的一级砖。他在墙根站了一会儿，信步向一个窄口拱型窑门里走去。……突然，一只小动物，不知是野猫还是野兔，被拐杖惊动，擦着姚连景的裤腿奔跑出去。姚连景先是一惊，接着又爱怜地笑了，仿佛和这暂借砖窑栖身的小动物，在感情上也有了某种牵连。窑体内，一片漆黑，一种异样气味，刺鼻呛喉。姚连景毫不在乎。在这里，他和社员们迎着熊熊火苗，装砖出窑，刚烧好的砖滚烫滚烫，他们那带着皮掌的手上，磨出多少血泡和老茧啊。……

心中扳倒五味瓶，姚连景此时的心绪一言难尽。在整部作品中，作者描写了他在家庭生活、爱情以至亲子关系上的失落感，也强调了他在工作上，与人民群众关系中失落感与内疚，虽然对于前者有时笔端流露了并非完全确当的情感，但总的来说作家把握得还是较有分寸的。姚连景并没有止于个人的悲欢上、恩怨上。从理智上讲，他也知道砖厂承包给个人，照样是集体财产，可能比原来还会受益更多。可是，从感情上，这个当年办社，连老婆都能不要的老人，从心眼里不放心。他深怕，“亲如儿子”般的砖厂承包出去会有不测风云。况且，带头承包者杨新堂，又出身不好，使他更生出一一种本能的反感。大半辈子阶级斗争的生涯，“左”的习惯势力以及封建宗法观念等，使姚连景背上一个无

形的沉重的包袱。这无形的包袱，背在身上时，姚连景其人其村付出了痛苦的代价；如今，要卸下它，也不可能一蹴而就。对姚连景这个“落伍的英雄”来说，我们宁可称之为一个“苦难的历程”。作者在这方面的描写，既有历史的深度，又有时代感。通过这个人物的塑造，作品形象地告诉我们：进一步解放思想，克服“左”的束缚和影响，是多么必要，又是一个多么艰巨的过程。作品的独创性在于，不仅为我们刻划了一个有特色的、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，而且描写得很有分寸感，没有作简单化的道德评价，表现了生活变革的不可逆转。作品没有把复杂的姚连景简单化，既没有无端的奚落他，也没有无端的美化他。尽管，作品中有一个地方，称他为“一尊粗糙的石像”，但他头上并没有一层神圣的光圈，他与村里群众的关系，归根到底还是“如鱼得水，如鸟归林”的，他有自己的忧虑、深思、探求、苦闷和兴奋，他有自己的常人之情（顺便说一句，作品中对他与杨新堂父子关系的描写，是有可议之处的）。作品艺术地表现了他在变革时代中前进的蹒跚步履及其“大趋势”，但又未划上句号；直到作品结尾他回村批驳了姚新泉，参加了砖厂的承包，他还处于“未完成式”的过程中，是符合生活与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的。

似乎可以这样说，作者在刻划姚连景的形象时，他的“出发点是从事实活动的人，而且从他们的现时生活过程中，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”。甚至人物“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、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”^①。正因为作者是从生活出发，是从发展变革着的现实生活出发，而他笔下的姚连景及八仙庄的一些村民又都同经济变革、物质生产密切相关，那么他们就必不可免的在现实生活的发展过程中，更新着自己的某

① 马克思、恩格斯《费尔巴哈》（见《马恩选集》第一卷，第30—31页）。

些旧思想、旧意识、旧观念。就姚连景来说，新生活的步伐在他思想上的“反射和回声”并不都是成正比的，有时也许不是“发展”而是抵制或趑趄不前，有时是新与旧的交锋与交叉，即使在人们看来是新观念取得了主导地位，而他本人也许还处于“当事者迷”的状态，甚至在头脑中还是“模糊的东西”。但他毕竟是一个老共产党员，是一个真正的功臣、模范。他虽然身在休养院，心却在八仙庄，不能忘怀村里的“乡亲们”和村支部的工作。回到村里后，他最为关心的还是村里的工作的真实情况。当他发现热气腾腾的生活背面，暗藏着令人不安的阴影时，他心事重重，食不甘味。初五离村时，乡亲们的送别，更使姚连景的心情如开锅的滚水在胸中纷沸乱翻腾：挂念，欣慰，不安，羞愧，怜爱，痛楚，悲凉……。这挥泪离村的情景令人荡气回肠，也给人一个信息，就是姚连景一定还会回来的。当我们再次见到他时，他确实发挥了“大支书”的作用，不仅识别了姚新泉的真面目，支持了并亲自参加了杨新堂等人的砖厂承包，还豪情满怀地参加了八仙庄元宵灯节大欢庆。他兴奋地感到，自己是只“迎来春天，赶上雁群的大雁”。这同他第一次回村，觉得自己象个空手串亲戚者相比，精神面貌发生了喜人的变化。

姚连景的形象塑造告诉人们，哲学能给人以启发，辩证法能使人物更丰满。虽然，在这方面作者还有发挥的余地，作者笔下这位很有“特征”的人物的典型化程度还可以再充分一些，但总的来说，这个人物是成功的、不可多得的。

四

杨新堂也是一个“发展过程中的人”，而且是一个成长中的新人形象。

在八仙庄他是一个“外乡人”，是从外地过继到他外祖父温克

林家来的。由于出身不好，受人歧视，性格阴沉多疑。三中全会以后，党的政策的阳光融化了他心头的寒冰，使他觉得心情舒畅、大有作为，决不比哪个人低一头，窄一膀。虽然，这种认识也许尚处于感性阶段，可是他的改善自身生活地位的要求，毕竟汇入了时代变革的潮流。这个人物的起点并不高，他经历了从本能、被动到自觉要求变革的成长过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作者描写的成长，不仅仅着眼于个人的道德品格，而是让人物从时代的潮流中吸取动力，是时势推着他向前迅跑的。在他原来的村庄，他当过生产队长，抓副业搞承包，一年使落后队翻了身，为他带来了荣誉，也给他增强了信心。到了八仙庄，他养奶山羊、种药材，揽电气焊活儿，又来承包每年上交利润五万五千元的砖厂，成了青年人的精神支柱和信得过的人，有的人甚至把他称为“及时雨”，他的住所成了青年们的“议事厅”。

这间农家老屋，显然是待迎新娘的房间。外墙涂成砖灰色，屋门窗户油漆一新。屋内四壁，用一种本地粉土粉刷得雪白生辉，烟薰如墨的屋顶，也糊裱上粉红花纸的顶棚。但屋中摆设，却同山村一般新房大相径庭。南面墙角的黑白电视机，已不算太希罕。幸福牌枣红色摩托车，却仍属凤毛麟角。北面的双人铁床，银灰色土暖气片，虽是自家焊制，花钱不多，可在当前山村中，就要算别具一格。更特殊的，是那个三角钢焊制的书报架，前边夹着几种报纸，后面放了不少图书，上头还有胡琴，横笛之类乐器。这个房间似乎不象个私人卧室，倒象个人们集合的文化场所。

这是以景托人，通过环境描写表现人物的身份、心境和思想性格。我们从杨新堂的住房，可以看出他确实“有点新时期农民的派头”。特别是幸福牌摩托车对于山村的“开放”，电视机与书报

收集所需“信息”，不能看作等闲之笔，表现了房屋主人的胸怀与眼光，表现了他的精明强干、自尊自强和作为新时期农村“领袖人物”的某些气质。

作品描写了杨新堂在承包砖厂中遇到的困难和挫折，揭示了他有时还表现出来的、隐藏在内心深处的“空虚感”，以及某些变态的破坏心理。这在他与大春苏的婚姻问题触犯了他的过于强烈的自尊心时，表现得极为突出、也极为符合人物彼时彼地的心境和性格。可惜的是，作者对这个人物的精神世界开拓得还不够深，杨新堂的心灵世界也没有更广阔地敞开，因而影响了人物性格的生动性、丰富性与深刻性。

可以说，作者塑造杨新堂形象的一个突出特点，是着力表现“新人的戏剧性的成长过程”（高尔基语）。作者主要表现的，是这个人物的倔强、傲岸和冷峻。“文革”中，他年轻，曾经自杀过，但他不是一个悲观厌世的人。他不会龟缩在狭小的萎弱的心灵里，“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，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”。那是在生活处于逆境的时候，他就在当时被打成黑帮的、地委领导干部屈明的开导下，以范仲淹的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的哲理语言作为自己的座右铭。粉碎“四人帮”、尤其是党的三中全会以后，也是他开始走向“而立之年”的时候，如鱼得水，天高地阔，生活给他提供了足够的用武之地，也使他经受了事业、爱情、道德等方面的痛苦磨练。从而他更加有骨气，有志气，坚信“靠组织，靠政策，靠科学”，总有法子对付一切艰难险阻，创造幸福生活。他的成长确实带有一定的“戏剧性”，迅猛性，从除夕的山野到元宵的灯光，短短十几天，他的思想成长给人的感觉，似乎可以借用一句古诗来形容：“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。”尽管，作者对这个人物的刻划笔力显得弱了一些，仿佛是人物性格的若干个点与侧面都写到了，但还不够浑然一体，还缺乏一种更内在的东西，缺乏一种更高水平的对人物的总体把握。但总的来说，作